

白爱菊 侯书林◎主编

管桦

作品评论集

GUANHUAZUOPINPINGLUNJI

中

管桦不但是作家、诗人，还是一位驰名中外的墨竹画家。他的作品《小英雄雨来》曾获首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

本评论集共分：书信、小说评论、诗歌散文评论、儿童文学评论、绘画书法评论、概评、作家谈创作、访谈录和管桦其人九部分。

大众文艺出版社

管桦作品评论集

白爱菊 侯书林 主编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管桦小说创作散论

赵 朕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在解放区作家群中，管桦是一位在解放区锻炼成长，经历了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作家。18岁那年，他面对农民为反抗日本侵略者揭竿而起的热烈场景，怀着一颗淳朴的爱国心，投身革命。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曾随八路军转战于长城内外，曾同战士们一起怒吼着向敌人冲锋，也曾体验到为祖国而战的战斗生活，有着不可言说的壮美。战争的经历，生活的感悟，为他奠定了创作的基础，他在战斗的间隙写的反映冀东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事迹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辛俊地》等，享誉文坛，激励和教育了几代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腾飞而英勇奋斗。1957年他遵照毛主席“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



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的教导，在师长周立波的启发支持下，全家回到故乡河北丰润落户，积累素材，收集资料，还创作了数十篇短篇小说，为他 70 年代初开始创作史诗性长篇小说《将军河》，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准备和物资准备。终于经过 20 年孜孜不倦地努力，完成了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将军河》，为长久地燃烧着他的心的时代，留下了“血写的记忆”；同时也以新的视角、新的认识，为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做出了新的贡献。他在《将军河》卷首诗中以“大风高歌壮士曲，浪花飞多英雄篇”的动人诗句，来抒发自己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热爱的情怀。管桦同志不仅是一位作家、诗人，而且他还是一位画家。在中国画中，他选择画竹，自成一家。他的墨竹粗干壮叶，给人以壮阔的感觉。他借这些“根生土地，渴饮甘泉，未出土时便有节，直到凌云高处，依然虚心”的竹，抒发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感，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贞情操和刚毅不屈的献身精神。他多才多艺，“文武昆档不乱”，在小说、散文、诗歌、书法、绘画诸方面均取得杰出成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书文书画兼备的名流。

—

权衡一位作家的创作贡献，重要的一点是看他的作品深刻程度：思想概括与艺术表现的特殊性，是否已化为他作品中令人注目的特色。这是因为“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



个别特殊事业的掌握和描述”，“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摹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①作家在创作时，必须以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去选择和处理题材，将自己的人格气质、思想识见溶汇到作品的血肉中，即溶汇到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人物性格，以及语言、气韵等方面，才能“掌握和描述”“个别特殊”的事物。由于管桦是被抗日战争的洪流，卷进奔腾呼啸的大海的，他和战友“一起勇敢地走进暴风雨”，经受着“闪电的抽击”，他“崇敬英雄们的广阔襟怀和以生命推动时代的勇气”，更感受到“伟大中华民族永生之力量”，^②于是他决心用自己的笔来描述这场他亲自经历的抗日战争。他的成名作《雨来没有死》是一篇别开生面、富有传奇色彩的短篇小说。后于70年代以此为基础，创作了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机智、果敢的抗日小英雄形象。在一次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中，雨来为掩护交通员李大叔，挺身而出，被敌人抓住。敌人对他进行了百般的引诱、威胁、恐吓，都没有使他屈服。于是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将雨来带到还乡河边枪毙。他却机警地在敌人枪响的瞬间，跳到河里潜水而逃。小说人物个性鲜明，形象生动，深刻地表现了中华少年同仇敌忾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抗日题材作品中，独树一帜，管桦由此而成名。但是由于工作的需要，管桦的工作几次变动，在5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精力用于歌词创作，没有机会实现他的宿愿。后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昔日的战斗生活的召唤，又激起他的创作冲动。但是，他也



清醒地认识到，建国后已经出版了很多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并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必须避免大同小异地重复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避免那些人人皆知、反复谈论，并且已为大家接受的东西”，他要“在这个共同的历史舞台上表述”自己的“认识和感受”，“必须选择别人还没有运用过的角度去反映那个本质”。^③

基于如此追求，他把取材的视点投向冀东地区的抗日敌后战场，在着眼于民族的、现实社会矛盾的同时，更非常切实地表现自己所熟悉的乡土、所深昧的风情，以及最熟稔的人物。并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中，辅以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技巧，就使他的小说既体现了自己的独特的“认识和感受”，又有着积极的思想倾向；既不重复别人写过的斗争生活，又展现了地域性的民族情调和气质。管桦于1957年初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辛俊地》，就是他进行创作探索的最初成果。

《辛俊地》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春天的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小说的主人公辛俊地是个年轻的游击队员。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对日本侵略者怀有仇恨，作战英勇，斗争的积极主动性强，但思想上存有青年人争强好胜的风头主义，干了些蠢事。尤其是他与地主女儿桂香的爱情关系，更遭到人们的非议。1958年六七月间，《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发表了读者对这部小说的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是《辛俊地》是不是一部好作品？如何看待辛俊地的英雄行为？作者以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刻画主人公？这种讨论实为批判，冀图否认《辛俊地》是好作品。“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将



其打成“毒草”，大张旗鼓地挾伐，从根本上否定了管桦的创作探索，造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项冤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株独秀的鲜花才得以重放光彩。

其实，《辛俊地》这部中篇正是作家不循规蹈矩，而以自己的“认识和感受”来反映时代生活本质的创作尝试。这部小说的创作意义就在于：第一，作家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生活体验，如实地反馈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从一个生活侧面揭出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和我们党如何艰苦地领导了这场农民抗日战争。我国的革命战争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的，但革命队伍的组成绝大多数来自农民，特别是敌后抗日战场的游击队，更是以当地农民为主体的。辛俊地就是其中一员，他既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有着朴实、善良、勇敢、坚强、嫉恶如仇的品格，又因小生产观念的局限，存在着个人主义思想。他就是带着这种性格矛盾投身于抗日洪流的，尤其是当他对敌斗争表现为十分主动和英勇时，性格中的弱点就膨胀为个人英雄主义，给革命队伍造成很大损失。而游击队的党政领导既要带领部队同敌人进行血与火的搏斗，又要帮助、教育像辛俊地这样的战士，克服小生产观念的影响。作家没有回避这种生活的真实，而是通过一个生活片断，形象地总结了敌后抗日战争的经验与教训，并揭示我党领导农民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

第二，作家没有按照惯常的手法来塑造典型，却是以新的艺术角度，如实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表现了作家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执著于自己的生活感悟和理解，敢于创新，勇于塑造独特的艺术典型的思想品格。在 50 年代



初期,《文艺报》曾针对当时文艺创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关于塑造英雄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文艺创作上普遍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创作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把复杂而丰富的现实生活简单化为几个概念所构成的公式。其原因是某些清规戒律束缚了作家的手脚,诸如不问作品描写的环境和,情节如何而一概不准写新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不准写新英雄人物工作上的过失或性格上的缺点“结果把新英雄人物写成千篇一律的、完美无缺的进步的符号。因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就不可能有真实性和具体性,当然也不会受群众所喜欢”。^④为了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茅盾指出,在创作人物性格时,如果“预先为自己规定了主题,然后按照需要去寻找人物,或者按照一种公式去填写人物。这样的人物,当然就不可能有明朗的个性和血肉的感情,也就不会产生艺术的感染力量”^⑤。管桦的《辛俊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作家在创作辛俊地这个艺术形象时,没有“直接配合政治任务”,也没有为他的人物头上罩以拉斐尔灵光圈。他是基于对当时斗争生活的如实反映和性格的塑造要求,并以其阶级的和生活经历为基础而创造的一个性格复杂的抗日战士的形象。同时,作家对辛俊地也不是一味歌颂,在小说结尾作家所写的“他使人愤怒,也使人怀念”的话,就说明作家在歌颂这一典型人物时,也饱含泪水鞭挞了他,为患有个人主义的人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把《辛俊地》置于50年代的历史环境来考察,这部小说不仅不是毒草,而是为塑造生活中实“在”的典型人物做出了率先的贡献。



视野开阔，规模宏大的3卷本的长篇小说《将军河》，是另一部以他自己的“认识和感受”表现历史本质的作品。《将军河》对抗日战争的描写，没有截取抗日战争最紧张、最激烈、最严重的阶段，正面描写两军主要战场的交战，钢与铁的撞击，血与火的拼搏。而是抉择了一个新的表现角度，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按照时代发展的需要，把已经尘封的历史进行深入地再思考。以便通过善与恶的厮杀、文明与野蛮的苦斗，以及爱情的热烈追求、对命运的奋力抗争，寻一条沟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结的渠道，从而使逝去的往昔再现新的思想光辉。

管桦在《将军河》“前言”中写道：“1970年我正式动手写作《将军河》，那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认为产生‘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奴性道德。在我写《将军河》期间，在爱国主义的总主题下，自然就有了对奴性道德的批判，或叫做对传统的奴隶意识的对抗”。^⑥这段话是他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相沟通的契机，也透露出他的创作追求。

《将军河》所表现的“对传统的奴隶意识的对抗”，首先反映在以古大鹏为首的龙虎村人，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岀，毫不畏惧的反抗行动上。当战争的灾难像暴风雨般降临在毫无防御戒备的将军河地区时，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日本鬼子的轰炸扫射，使龙虎村人的灵魂经历了暴风雨的涤荡。地主台荣候认为“日本人总得派个大乡长执理政权”，他将要得到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机会；老铁匠冯顺感到悲观失望，哀叹着“我们要当亡国奴了”！可是曾



经当过义和团团首、在大沽口打过八国联军的古大鹏却认为，中国有了“能人”共产党，“老百姓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军的”。于是他紧紧地抓住摆脱个人奴隶命运的机会，焕发出年轻时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精神。他和他的孙子古佩雄勇敢地抵制了地主台荣候当顺民的奴才哲学。在村里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亲人送葬时，古大鹏集合村民，以当年义和团的传统方式长跪举刀宣誓：“誓死不当亡国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他没有向恶势力卑躬屈膝，也没有接受地主台荣候强加于他的一切束缚，而是发挥出“自己人格的全部力量”，^⑦勇敢地投入了摆脱个人奴隶命运的斗争。小说所描写的古大鹏对抗传统奴隶意识的行动，为全书奠定了思想基调，也是历史生活本质的生动反映。

其次反映在古佩雄与抗日队伍领导的矛盾上。固然，古佩雄投身于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摆脱个人奴隶命运的重要内容。但对个性鲜明的古佩雄来说，他对传统奴隶意识的对抗，还主要体现于善于独立思考、不趋炎附势以及对“真我”的追求。古佩雄带领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佯攻黄花港时，为了解救被敌人赶上火线的妇女，他根据实际战况采取端鬼子老窝，解救妇女的办法，向敌人发起进攻。可是却受到区委书记王兴的批评。对于这种人生的委屈，他“不颓丧，不乞求，不解释，不分辩”，只以沉默待之。他的沉默并非是屈从，而是一种对宗教性恐惧的抗争。当他逃出敌人的虎口，又遭到八路军逮捕并准备处决他时，他对冤枉和屈辱的忍受已达到极点，再也不寄希望于他人的公道和仁爱了。在他看来，只有壮丽的死才能慰藉他那不屈的心灵。



他三进三出冲杀于敌人的重围，救出三个县委机关的同志，不是想借机戴罪立功，以求得领导的承认，却是被“自身力量的狂喜、拼杀的狂喜、把敌人消灭的狂喜”支配着。^⑧这种狂喜是出自对奴性命运的反抗，也是他追求“真我”的感情与理智的升华。如果说上面论列的内容，反映了古佩雄对他的顶头上级没有唯唯诺诺的宗教性恐惧的话，那么他在无法与上级联系的情况下，带队回将军河地区的行动，则属于对大人物的错误指令的反抗。当时某位大人物命令“豁出个团，也要打开满洲边境线”；军区派古佩雄带队进入满洲无人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古佩雄苦战一年，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一个营，而且弹尽粮绝。是甘于被日本鬼子消灭，还是保存实力？古佩雄选择了后者。尽管他因此受到处分，但是他的心灵更圣洁了。他能根据具体的战争环境，具体地作出决策；不为传统的奴隶意识和对上级的宗教性的恐惧所束缚，而采取果断行动，正是这个人物光彩的所在。

在管桦的短篇小说中也涉及到对世俗的奴性道德的对抗。如《鹰巢岭》中的“胭脂红”，命运悲苦，人们说她是“穿白孝衫子的命”，而她偏穿胭脂红的衣服，以示对命运的抗争。即使是反映建国后农村生活的《葛梅》，对支农的农药、农具物资，不单独根据上报的数目，而是进行亲自调查研究。葛梅这种不迷信上级，不随波逐流的品质，也体现了对世俗的奴性道德的批判和对自我价值的确认。



二

管桦在《长篇与墨竹》中说：“我写战争，不是为了去写战争，不是在人生中感受到战争，而是在战争中感受到了人生。因此，我努力去写战争的人类，而不是人类的战争。人与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在战争和动乱中，才是赤裸裸的，人和社会的本来面目，在那个条件下才看到最真切。”又说，人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正的自我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作家的自白，反映出他在创作抗日战争题材小说时，始终把人物性格的塑造作为构思的轴心，着力表现性格与环境（社会）、命运关系的创作追求。

就性格、环境（社会）、命运三者来说，性格决定命运，而环境又制囿着性格，因而，如果不与人物的命运、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不能刻画出个性鲜明的性格。对古佩雄的性格刻画，作家就是切住性格、环境（社会）、命运的辩证关系，来展示其个性风采的。他生在一个特殊的农民家庭，爷爷古大鹏当过义和团团首，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立过赫赫战功。父亲古振荣是煤矿矿工，在牵头与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罢工斗争中英勇就义。他从小就受到这种反抗命运的影响，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宗教性恐惧。

长成后，他与地主台荣侯及其狗腿子“三阎王”的抗粮算账斗争的几次交锋，激发了他的阶级意识，特别是在困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同日本侵略者的铁、血、火的斗争中，



更强化了他不愿做奴隶的反抗精神。这种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交织的斗争环境，加之“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传统民族精神的哺育，使他形成了嫉恶如仇、刚毅豪爽、机警睿智、见义勇为，怀有民族大义，勇于坚持真理，抵制奴性道德，敢于同悖理与邪恶斗争的美德。

我们从作家提供给我们的这个人“过五关，斩六将”的情节来看，他的确是一个响当当的英雄人物。如巧妙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从天津取来电台；只身闯入“维持会”总部收缴了保卫团的枪支；在龙王庙乔装成渔民抗击日寇收鱼和打死佐佐木；潜入黄花港炸死渡边；以及三进三出于敌人包围圈，救出县委领导等一系列情节，都反映了他足智多谋、英勇无畏，出生入死在所不惜的英雄品格。无疑他是一个融淳朴的农民本色、刚强的战士本色和雄才大略的英雄本色于一体的人物。

然而，在古佩雄成长过程中，他的性格美德却面临着环境的挑战，使他经受了一次次不是来自敌人而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磨难。设若我们换个角度说，在接受佯攻黄花港时，面对敌人把妇女推上火线而不予解救，他不但不会受伤，也不会挨区长王兴的批评；在被敌人逮捕后，接受渡边的拉拢腐蚀和委托，或许他马上会飞黄腾达；奉命出兵“满洲”时，弹尽粮绝，被敌人打垮，他不会受处分，甚至成为烈士，名垂史册。但是他的性格基因却自觉地、坚定地、义无反顾地抵制了这些行径，甚至为此失去了相爱多年的夏俊梅。这里既反映了古佩雄在正义与邪恶斗争中，在崇高与平庸的冲突里所显现出来的高度的思想觉悟，也突现出他不为环境所役



使的独特的个性。正是由于他具有这样独特的个性，才不为环境所容纳。也正是由于他的个性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态度，才影响到他的命运，使他成为一个充满命运悲怆的英雄人物。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崇高与滑稽》中说：“在美的境界中，一切都应当是充满生气和真实的。在追求中缺少了多样，这就不会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人。因为，在艺术中一个至高至善的人就应当拥有一个生气蓬勃的人身上所体现的那种追求的全部多样性。”古佩雄正是这种充满生气和真实的“多样性”的人物。其实，辛俊地（《辛俊地》）也不例外。如前所述，他是一个怀有爱国热情，对敌斗争勇敢无畏的英雄。他擅打伏击，打死游击队的“关系人”，而被游击队开除回家，但他并不消极，抓住一切机会表明自己是游击队的人；地主徐怀冰要向警备队交公粮，他闻讯后予以制止；麦秋时鬼子来抢收，他主动带领民兵打退了敌人；敌人围村来抓辛俊地，抓不到他就拷问群众，他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等等，都写出了他性格中闪光的内容。但是他那争强好胜出风头的个性，却也使抗日斗争和他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参加游击队截粮埋伏时，他旧病复发，率先开枪，导致截粮失利，队长白虹受伤。尤其是他与徐怀冰女儿桂香的爱情关系，他没认识到桂香是利用他“填补她苦闷而又空虚的生活”，却当成了真正的爱情，最后在阻止特务运粮的埋伏中被徐怀冰打死。辛俊地的悲剧正是他的性格与环境失衡的结果。小生产习惯势力、模糊的阶级意识束缚着他，使之在严酷的斗争面前只注意民族矛盾斗争的尖锐性而淡漠了阶级观



念，因而使辛俊地这个性格上有弱点，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青年民兵，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未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导致了终生的遗憾。

在长篇小说《将军河》中，作家以深情的笔触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形象。如豪爽仗义、阅历丰富、刚强果断、爱憎分明的古大鹏，是一位跨越两个时代的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思想性格是在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他把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帝斗争同抗日斗争有机地联结在一起，从而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甘外辱、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又如沉着干练、智勇双全的周世忠，是发动和领导将军河地区抗日斗争的党的领导的形象。他对将军河地区的人们有感情，尤其是对他亲自培养的古佩雄更有深入的了解。但他性格上有着软弱的一面，他为了顾全大局，协调集体领导，也难免做出违心的事，未敢正面支持古佩雄，使古佩雄经历了更多的磨难。再如刚愎自用的联合县长王兴、随和爽直热情的牛贵、用心险毒的潜伏特务澹台云梦，等等，都塑造得神气活现，惟妙惟肖。既符合社会生活的真实，又具有审美价值。

“当完美的精神（或叫理想）变成物质的时候便不会是那么完美的，一切完美都存在于不完美之中。”^⑨作家的这种美学（哲学）的认识，体现了他所着力塑造的古佩雄、辛俊地等男性形象中，更能在他写得很出色的女性形象中找到依据。管桦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注意紧扣时代与环境，在美与真实的谐调统一中，注意揭示人物的心灵的冲突，或显示其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向旧世界宣战的高尚品格，或显示其对



美的渴望与追求，都映现出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的折光。

在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有泼辣、洒脱的吕二嫂（《旷野上》）：她在遭受丈夫参加抗日暴动后杳无音讯、女儿为八路军送信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打击下，并没有消沉、委颓，反而把仇恨化为力量，更为积极地担负起交通员和照顾抗属的任务，用她的无私的品格和果敢的行动，显示了她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有性格爽朗，顽强的“胭脂红”（《鹰巢岭》）：她父亲惨死在煤矿矿井，母亲因疯坠下鹰巢岭，13岁就被迫给地主放猪，不仅饱尝了人间的酸辛，还被诬为“丧家货”、“穿白孝衫的命”，可是她却以挑战的姿态对待生活。战争年代，她不顾个人安危地救护伤员，手续严格地传递党的信件，出色地完成着交通站站长的任务。建国后，她带领群众凿山引水，开发矿山，焕发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拼命精神来为人民造福。还有聪明美丽、纯洁放任的沈媛媛（《将军河》）：她为了家乡的抗日斗争，中断了大学学业，投笔从戎。她摒弃旧的传统观念的羁绊，大胆地表白自己的爱情，勇敢地追求人生的欢乐。在鬼子围村时，她为解救将要被鬼子蹂躏的妇女，挺身而出，甘愿刑场赴死，以生命换取对美的期盼。这些女性形象大多经历过“炼狱”中的煎熬，心灵上存有不同程度的创伤。但是她们都能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用百倍的努力或用生命，去实现对美的追求。

与这些女性形象相左，作家还在更高的艺术概括上，刻画了另一类并不完美的女性形象。这就是《将军河》中的张二嫂和夏俊梅。

张二嫂是一个善良、柔情的农村少妇，也是一个受到过



人们的嘲笑、排挤、压制，甚至侮辱而显得谦卑、渺小的人物。但其形象的意义却是一个极力摆脱灵魂的污染而执著于追求完美的却不完美的艺术典型。她家因生活贫困，丈夫被地主骗去当伪军，死在战场。由于她年轻、漂亮、姿色出众，常受到男青年的调戏。地主保卫团班长刘栓儿在她生活拮据、精神空虚时占有了她，使她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得到了暂时的满足。因此古大鹏、夏俊梅及其他姑娘们都瞧不起她。孤立的处境使她更以刘栓儿为靠山。在党的领导人周世忠来古大鹏家布置工作时，她发现后就没深没浅地告诉给刘栓儿，给古大鹏家造成一场虚惊。虽说不是张二嫂有意告密，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终于惹出祸端。张二嫂不同于孙犁的《风云初记》中的俗儿。俗儿起初曾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抗日热情，但最终还是无可挽回地沉沦下去，成了人民的罪人。而张二嫂虽然生活不检点，虽然无意间惹过祸，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热情的女性。在“人人都抗日救国”的热潮鼓舞下，她也不想“在家吃闲饭”，要求参加妇救会为抗日救国出把力。这实际上是她追求精神完美的反映。

古佩雄在黄花港受伤后，张二嫂送来一笼筐鸡蛋，来表示她参加抗日的实际行动。后来听说警备队来抓捕古佩雄，准备找一头毛驴转移古佩雄。夏俊梅让张二嫂去借。此时张二嫂接受了任务，显得异常地精神焕发，逢人便说：“妇救会忙不开，主任打发我来了。”尽管村里人流露出鄙视的眼光，但她还是一副庄重、严肃的神情，内心里却充满着自豪感。

基于她发自内心的抗日热情，不仅不在乎村里人的奚落、